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马荣升 高新涛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45)

[摘要]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 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 传统大国趋向衰落, 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 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 中美关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大国关系趋向缓和, 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 国际秩序酝酿结构性调整, 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地缘政治; 国际秩序; 新兴大国; 中美关系;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0.06.007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0)06-0049-(8)

[收稿日期] 2010-07-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地缘政治与新时期国家安全”(07SJD6800007)

[作者简介] 马荣升(1970-),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高新涛(1973-),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讲师, 博士。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历时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基本结束, 世界经济开始转入漫长的复苏阶段。此次危机破坏巨大, 影响深远。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图的破产, 全球地缘政治经历重大变迁, 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 2009年 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 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 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 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 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这是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形势的一个新判断和新认识, 对我们正确把握后金融时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理性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具有指导性意义。

一、国际体系分化重组, 由此重绘全球地缘政治版图

2008年是国际体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 有三件事意义非凡: 一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夺得金牌第一; 二是俄格发生军事冲突; 三是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全球性金融风暴。前两件事标志着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强势崛起, 后一件事标志着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走向衰

落。上述事件涉及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三个大国,它们彼此独立,互不关联,但却从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折射出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

当今的国际体系形成于二战之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体系。该体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经历了动荡、分化与重组,90 年代前后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经历重大冲击,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的世界矛盾仍是邓小平概括的“东西南北”问题,但经历此次危机后,矛盾主体和矛盾性质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化。

东西矛盾主要表现为社资矛盾,冷战期间以美苏争霸为主要标志,冷战结束后,这一矛盾并未随苏联的解体而消亡,而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来,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俄罗斯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同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矛盾。近年随着俄罗斯的强势崛起,俄开始大幅调整对外战略。2006 年,时任俄总统的普京公开宣布俄罗斯将改变此前以融入西方为目标的对外战略,而要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世界影响力。其后,俄对西方立场趋向强硬,同西方的矛盾不断激化。2008 年 8 月的俄格冲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对俄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相反,由于中国国力迅速提升以及采取了正确的、富于策略性的对外战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趋向缓和、淡化,这在近年表现得尤为显著。未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矛盾将逐渐转换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矛盾。

西西矛盾趋于淡化但其内部关系并不稳固。美欧矛盾曾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严重裂痕,但近几年得到修复,俄格冲突期间西方国家对俄几乎给予异口同声的谴责。萨科奇执政后,法国重返自 1966 年退出的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标志着西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此次危机也暴露了西方联盟的脆弱性。危机来临后,各国力求自保,几乎没有协调一致的政策。作为北约成员之一的冰岛在危机中不得不求助于俄罗斯,说

明西方关系并不牢固。

南北问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传统大国衰落,南北矛盾主体局部易位,结构性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此次危机在带来全球性破坏的同时,也给南北问题带来大变革和大调整。在南北关系中,传统大国趋向衰落,新兴大国加速崛起,国际力量结构酝酿质变。有人预言:“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中国可能面临‘他国让位机遇’。”^[1]从发展趋势看,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将成为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二、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兴大国崛起和传统大国衰落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动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次危机引发了彼此独立又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大国的衰落。那么,究竟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还是传统大国的衰落催生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含义深刻。实际上,新兴大国的崛起不是依靠传统的战争方式,而基本是依靠自身的内涵式发展来实现的,这使得其崛起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同样,传统大国也不是因为遭到新兴崛起大国的打击而走向衰落的,而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在全球份额中的减少、发展模式遭到置疑以及对世界事务领导能力的下降。可见,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时间的发生上具有偶合性,但不存在空间上的对撞性。但是,此次危机却使二者产生了高度的关联性,因而比冷战结束以来发生的任何重大国际事件都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是 21 世纪全球最为壮丽的地缘政治景观。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此次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金砖四国”高调亮相和 G20 取代 G8,是这一结构性调整的肇始。自“金砖四国”作为一个概念被高盛公司提出以来,新兴大国开始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战略力量登上

国际舞台。四国不仅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保持磋商、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诉求,还接连举行峰会,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使国际政治舞台焕然一新。G20的最初设计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一个沟通的渠道,充其量只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非正式论坛,此前从未举行过峰会,但金融危机爆发后,自2008年12月至2009年9月,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竟密集举行了三次峰会,凸显了它在非常时期非同寻常的作用和价值。G20容纳了当今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涵盖了所有新兴经济体,这使其较其他任何组织都更能客观地反映当今的全球力量格局。冷战结束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经济体,近10年来尤为显著。目前,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比重已由冷战结束初期的39.7%上升至50%左右,“金砖四国”GDP全球占比由2001年的8%上升至2008年的16%。尽管受到危机影响,但2008年“金砖四国”的增长率仍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增长9.0%,最慢的巴西也达5.2%。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增长率大多在1%左右,日本为零增长。2008年11月,IMF在发布的世纪经济增长预测报告中指出,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预计到2020~2030年间,“金砖四国”GDP将超过发达7国,其世界份额也将由目前的40%升至60%。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使得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速度上超过发达国家,国际力量变迁开始朝新兴国家倾斜。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构成强力冲击。冷战的终结曾被美国视为建立单极世界的历史性机遇,“9·11”事件促使其加快了谋霸的进程。2003年5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英国时,曾把多极理论斥为“恶魔”,呼吁各国放弃多极世界的幻想,但随着美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和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内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开始对单极世界产生了怀疑,以至于赖斯本人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2006年1月,她在乔治敦·华盛顿大学发表题为“变革外交”的演讲中,称“21世纪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新兴国家正在越来越有力地塑造历

史前进的方向”,^[2]等于默认了多极化的现实。实际上,从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美国战略界已认识到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建立单极世界的冲击,普遍认为“单极世界已经或正在结束”。约瑟夫·奈认为,在军事领域美国保持了绝对优势地位,但在其他方面,“世界正在经历现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移”,美支配地位逐渐消失,世界开始进入“后美国时代”。^[3]不过,他认为美国的衰落并非是自身实力的下降,而是“无法控制的问题越来越多”。^[4]曾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明确提出:“多极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5]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2050年全球趋势:一个转换中的世界》报告中无奈地指出:“美国的统治能力将在2025年之前大幅削弱,在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方面,美国的重要地位也会逐渐下降”,^[6]哀叹美国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的影响力将逐步衰退,不能再继续发号施令。

以“变革”为竞选口号的奥巴马上任前也曾雄心勃勃,他对单极世界的追求不亚于小布什。他在《无畏的希望》一书中指出:“即使遭到反对,美国也必须充当世界警长”,“美国有权力对那些准备破坏美国目标的国家采取行动”,“联合国安理会从一开始就无权否决我们的行动”。^[7]然而,他上任后却发现前任留给他的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单极世界变得遥不可及,因而不得不放低身段,企图通过运用“巧实力”、“重启”美俄关系、倡议建立无核世界等手法,对美全球战略进行收缩性调整,以期渡过难关,竭力保持美国在各领域的优势地位。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使得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冷战结束以来严重失衡的全球力量对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国际权势结构由传统大国向新型大国转移,国际格局由立体趋向扁平化,国际权势由集中趋向分散,国际关系趋向民主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此次危机尚不会对国际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美一超地位短期内尚难以撼动,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的出现仍是远景目标。

三、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中国最具代表性,而中国的崛起又与美国的衰落同步发生,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对危机后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具有风向标意义。

实际上,美国的衰落并非始自此次金融危机,但危机使美国的衰落更加明朗化了。从根本上说,美国的衰落始自“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扩张过度必然走向衰落,这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避免的结局。当前,美国的衰落主要表现为两个“下降趋势”。一是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份额中呈下降趋势。二战结束初期,美国GDP曾占全球一半以上,但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到90年代降至25%,21世纪初一度回升至32%,其后又开始连续7年下滑。据世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GDP约占全球份额的25%,2008年回落至24%,2010年可能进一步降至20%。二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出现下降趋势。小布什执政期间,以建立单极世界为目标,单边主义突出,四处扩张,连年征战,不仅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力,还导致美俄关系出现重挫,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奥巴马执政后不得不对前任的单边主义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也不得不花相当大的精力来改善美国日益糟糕的国际形象。金融危机期间,涵盖众多新兴经济体的G20空前活跃,而曾风光无限的G8黯然退后,说明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支配能力已大不如前。2008年发生的俄格冲突可视为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空前下降。冷战结束以来,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未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对他国发动军事打击而不受惩罚,但俄罗斯却成了例外。在体育领域,美国也首次丧失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奥运金牌第一地位。对于奥巴马发出的无核世界的倡议,国际上附和的声音不少,但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多。

除硬实力受损外,美国模式和美式价值观吸附上出现同步下降,由此使美国的软实力也受到

严重损伤。美国一直自诩为民主“样板”和市场经济“模范”,但此次危机证明,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监管缺位等不良基础之上的,这使得美国模式和美元信用出现雪崩式坍塌,它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其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在华尔街大危机爆发之初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敏锐地指出:“未来两年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权势因其内外困难而来的显著衰减使之有等同于苏联崩溃那样的意义,金融危机的现实和经济衰退的前景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的所谓优越性显得极不确定,人们开始大为怀疑这些是不是应对世界严重问题的最好办法。”他的话在危机期间得到充分验证。经历此次危机后,美国或将永久结束其同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领域都占绝对优势的超强地位。

当然,美国的衰退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缓慢而非激进的。尽管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份额中不断下降,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日趋减弱,但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各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仍占绝对优势。此次危机虽重创美国金融领域并波及其实体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具有较强的承受和应变能力,尤其是依然具有显著的经济活力、比较完善的自我纠偏机制和制度创新能力,甚至还有成功转嫁危机的能力,从而基本保证了美国不会因一次危机而永远一蹶不振。

与美国走向衰落相反,中国强势崛起是此次危机引发的全球最大地缘政治变动。一年前,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名列金牌第一,一些西方学者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背后的地缘政治意义而将2008年称为“中国元年”,尽管那时金融危机的后果还远未显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中国GDP已超过德国而位居世界第三。MF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实际增长8.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高达50%。尽管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受损程度较轻。另一方面,中国借助此次危机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华丽转身,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时间将大为缩短。

近年,高盛公司不止一次调整预测时间,将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从21世纪40年代提前到20年代的某个时间。

与硬实力同步增长的,还有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日益增强的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由此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等均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乃至赞誉,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此次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赢家是中国,它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模式毫发未伤,这自然而然会增强其全球地位”^[8]。德国《法兰克福报》2009年3月31日刊文指出:“尽管金融危机的后果还无法全部预料,可是有一点今天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它加速了国际权力关系的改变,有助于中国发展成为与美国并肩的全球权力中心。这场危机可能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转折点。”相应地,随着发展模式的成功和对国际体系的重新认知,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更加负责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危机期间,中国不仅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以实际行动履行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还大力倡导国际金融领域改革,并在重大国际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促使美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由于美国需要中国援助来渡过难关,遂暂时不再视中国崛起为威胁,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以合作与协调为主。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中称:“有些人认为崛起的中国一定会是对手,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美中都能从对方的成功中受益,也都能为对方的成功作出贡献。”“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美国仍将致力于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对未来美国的和平、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内出现了“中美国”、G2等说法。从深层次上说,美国内炒作所谓的“中美共治”,不是因为中国已强大到令美国平视甚或仰视的地步,而是美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强势崛起的中国做出某种安抚。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又提出

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对华政策新概念^[10],试图通过中美双方的战略保证来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防止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破坏性力量。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将由此发生转折性变化?美国真的打算和中国这个不同意识形态的新兴大国和平共处吗?目前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具有权宜性的一面,系统的政策调整仍在酝酿之中。

但不论如何,中美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变化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并开始进行某种调整,由此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另一种巨变:中美关系取代美俄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奥巴马语)。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但却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真实写照。变化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使冷战结束以来严重失衡的全球力量对比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有助于达成新的战略平衡。

四、全球地缘对抗色彩进一步淡化,大国关系进入合作与协调时代

此次危机“表”在美国金融领域,但“根”在美国过度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企图凭借超强实力建立单极霸权,因而四处扩张,如通过北约东扩在巴尔干肆意动武,以反恐为名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主权政府,在中亚进行地缘扩张,在中东强行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等等。正是这种全球性扩张引发了广泛的地缘冲突尤其是加剧了大国矛盾。美国虽在军事上轻易赢得了伊拉克战争,但却难以实现战后和平,在宣布“主要战事结束”后的六年多时间里竟又付出4000余军人的生命代价、耗费2万亿美元的战争费用。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严峻,奥巴马的“阿富汗战略”前景难料。二战以来,美国一直自信地认为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如今证明这只不过是自大狂的表现。此次危机,美国多少意识到单边主义带来的苦果,因而不得不对其内外政策做出某些调整。奥巴马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大国关系,修复美国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表现在美俄关系上,通过“重启”促使两国关系走出低谷、回归正常,通过暂停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对

俄进行安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更为明显。危机期间美国国内关于 G2 机制的论争,从侧面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开始某种新的调整。尽管美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一些问题上屡屡制造麻烦,但合作已然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在 2010年 5月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两个大国致力于建设面向 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的蓝图已然清晰。未来,两国关系将更加突出协调与合作的一面,这预示着中美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下降。在全球热点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重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也降低了此前的高压态势,更加重视依靠多边机制加以解决。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缓和战略将有助于实现全球和地区稳定,并将带动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

在地区层面,危机再次凸显了区域合作的价值,由此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大国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为应对危机,欧盟主要大国加强了内部协调,旨在加深政治一体化的《里斯本条约》有望得到尽早批准和实施。在东亚,危机催生出现区域合作的新态势。作为东亚区域整合的主要力量,中、日、韩三国已开始真正意识到区域合作的价值和意义。自 2008年 12月三国在日本福冈首次举行了不借助其他平台的峰会后,又于 2009年 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峰会,核心议题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复苏。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执政后,出于提振经济的考虑,开始大力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并提出建立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远景目标。如果东亚各国联合推动,那么一直进展迟缓的区域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危机催生出的东亚地缘政治新变局。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关系也同时存在可能诱发新的地缘冲突的因素。危机虽为大国加强合作搭建了平台,但由于经济与政治的连带效应,某些非经济问题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激化,某些潜伏热点可能再次升温。为应对危机或转嫁矛盾,某些大国也有可能在世界战略区域(如资源富集区或战略通道)强化战略利益,由此可能导致大国关系的重新紧张。在传统热点区域,即从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所谓“不

稳定弧”地带,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有可能借机发难,重趋活跃,从而给地区形势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近期,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呈高发势头,反恐形势陡然严峻,由此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地缘热点。

五、国际新秩序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增大

国际秩序是指以一定国际格局为基础形成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的保障机制的总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主要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是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基础之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自 20世纪 6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就开始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海湾战争结束后,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均提出了各自的国际新秩序主张。此次危机期间,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热议话题。

历史上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等,莫不如此。此次危机能否催生国际新秩序尚有待观察,但危机为新秩序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各种危机接踵而至,较大规模的危机就不下 20余次,尽管并非每次危机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重大变迁,但每次危机后又都不是简单地回归原点,而是以渐进、累加的方式推动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并最终改变着体系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人们普遍认为,此次危机严重程度虽不及 1929年,但已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衰退。经合组织(OECD)将其定位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覆盖面最广”的“一轮衰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其为“百年不遇”,基辛格甚至认为是“四百年未有之变局”。毋庸置疑,危机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冲击,也充分暴露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弊端和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倡议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深入和系统的金融改革”。就连美国也意识到,现存经济秩序已很难再维持下去。在

2009年9月匹兹堡G20峰会中,各方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G20取代G8成为今后国际经济领域的主要协调机制,并一致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在2009年10月初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IMF和WB年会上,与会各国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IMF总裁卡恩还敦促发达国家在2011年1月之前将5%的份额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懈努力。冷战结束前后,中国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此次危机期间,中国关于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吁再次得到广泛重视。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莫斯科G20峰会时曾指出,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有更大发言权,并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和“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主张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从本质上说,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势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必然引发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激烈斗争,因而将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新秩序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旧秩序的固有能量得到充分释放之前,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国际新秩序更非一国能力之所能及,需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以推动多极化为基本途径,加快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

六、结论:中国面临着历史性机遇

保罗·肯尼迪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战略家的责任,就是在随后的混乱和喧嚣中,透过纷繁的表象和迷雾,认清已被改变的战略版图,并由此确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11]此次危机尚不足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撼动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但从发展趋势看,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方向和脉络已经清晰、明朗。尽管诸多不确定因素使我们对

危机产生的实际后果难以精准把握,但它所造成的转折性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变化将不可逆转。

大变革意味着大机遇,大机遇带来大发展。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我们在应对危机的同时,更应把握其中蕴含的机遇。我们一直渴望成长为世界大国,如今,历史的机遇不期而至,那么该如何把握呢?

首先,应适时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保持外需与扩大内需齐头并进,同时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快金融创新,使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危机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并潜藏风险,为此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加大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等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平衡和稳步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此次危机适时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在未一个时期就有望保持经济的高速、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我国制定的大战略目标就有了实现的保证。此次危机的严重后果还表明,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规避并化解潜在风险,两者必须齐头并进。此次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重挫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元霸权的神话正在消失”,^[12]危机产生的后续效应也弱化了欧元的新兴优势。与此相反,危机凸显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后发优势,这为中国参与制订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规则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但是,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尚未完善,还缺乏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体系能力,能否抓住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化“危”(危机)为“机”(机遇)的能力。中国之所以未在此次危机中严重受损,主要原因是金融系统未完全放开,但这种避险效应今后不可能再有。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要有效规避全球性金融风险,需大力完善金融体系,同时要加快金融创新并建立完善可靠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此次危机将加快这一进程。为此,应以促成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结算货币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应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积极推动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使中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得到重大改善。如前所述,此次危机引发中美力量对比出现于我有利的重大变化,这为中国借机改善全球战略态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缺陷,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努力遭受重挫,世界多极格局进一步发育。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务实的多边主义政策,这在客观上为多极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此次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进程,增强和提高了中国作为多极格局中一极的实力和地位,如果能借此将多极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则将使我国在 21 世纪前叶的国际战略态势发生积极变化。

最后,在对外战略指导上,应以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缘角色为契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如果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成就了中国的东亚核心国家地位,那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为此,需要我们适时调整全球战略蓝图,以世界大国来界定中国在未来全球地缘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中国必将崛起为世界大国,这是我们对国际政治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判断,此次危机将加速这一进程。这需要中国与时俱进地实现国际角色转型,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遵循者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塑造者转变。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当前的实力和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处理好责任与能力、权利与义务、建立国际秩序与解决国内问题的有机统一,合理设计对外战略目标,正确运用各种手法,唯此才能抓住大危机带来的大

机遇,加快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 唐双宁.中国必须抓住“他国让位机遇”[N]. 环球时报, 2009-09-08.
- [2] 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Shaping US Diplomatic Posture in the 21st Century[Z/OL]. January 18, 2006.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637/transformational_diplomacy.html
- [3] Joseph S Nye Jr. Thriving in a Post- America- Centric World [J]. The News Weekly, May 12, 2008.
- [4] 约瑟夫·奈.“美国衰退论”并未切中要害[N]. [日]东洋经济, 2009-10-17.
- [5] Francis Fukuyama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J]. The Sunday Times, May 25, 2008.
- [6]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EB/OL].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7826/global_trends_2025.html
- [7] 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Crown Publishers[Z]. New York 2006.
- [8] Roger C. Altman.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Further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J].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9.
- [9] Hillary Clinton. We Are Ready to Listen to Asia, Remarks in Asia Society [Z/OL]. New York, Feb 13, 2009. <http://www.asiasociety.org/policy-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us-asia/hillary-clinton-we-are-ready-listen-asia>
- [10] 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 S. - 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Z].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24, 2009.
- [11] 宫力.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9, (4).
- [12] 潘锐.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 [J]. 东北亚论坛, 2009, (1): 11.

[责任编辑 李英武]

Global Geo- politics Changes in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and China's Opportunity

MA Rong- sheng GAO Xin- tao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PLA Nanjing Army Command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45,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a far- reaching impact on the world configu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turbulence since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will come forth after the crisis. Firstl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and the old fall, which will cause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to polarize and regroup. The process of multi- polarization will therefore reach to a new stage. Secondly, Sino- U. S. power balance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and Sino- U. S.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bi- 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hirdly, relationship among big powers will become moderate and geo- conflicts both globally and regionally less intense. Lastly, a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coming to forth. As a result, China face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great powers Sino- U. S.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system